

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现象探析*

Research on the verbal aggression of the China football spectators

赵阳¹, 石岩²

ZHAO Yan¹, SHI Yan²

摘要: 本文在阐述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现象的基础上,从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分析并提出导致这一社会问题的成因:(1)我国足球场的环境因素:榜样性启动、社会控制软弱;(2)我国足球观众自身的因素:认知偏向、社交技能贫乏;(3)言语攻击行为变量——情绪及其外化。为遏制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和提高足球场看台观众文明水平,本研究提出了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的应对策略:(1)预防策略:行为强化、社会控制;(2)中断策略:现场监控、指导性控制、立即处理、避免无效措施。

关键词: 观众;骂人;言语攻击;赛场文明;足球场

中图分类号: G8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90 (2006)02-0082-05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research on the reason of the verbal aggression of China football spectators from the aspects of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nd sociology based on looking back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results are: (1) Environment factors: exemplar start-up, social control flaccidity; (2) Spectator factors: cognitive deflection, social skill lack; (3) Verbal aggression behavior variable: emotion and emotional behavior. A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p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tadium civilization level of the national football spectators. (a) Preventive strategies: behavior reinforcement, social control; (b) Interrupting strategies: scene monitor and control, instructional control, instant coping, ineffective measure avoidance.

Keywords: spectators; cursing; verbal aggression; field civilization; football field

从1994年我国男子足球进入职业联赛以来,赛场文明问题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中国足协依法对各个赛区偶发的骚乱予以了处罚,但是,足球场看台上观众集体骂人的不文明行为却鲜有处罚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前我国正处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积极营造“人文奥运”氛围的时候,这种不和谐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严重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我国足球场上出现的观众言语攻击现象作以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1 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现象

1.1 言语攻击的定义

对于攻击行为(aggression),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如Bandura,1973;Kerr&Nelson,1998;Lancelotta&Vau ghn,1989)。但是,人们对攻击行为有一些共识,即攻击是以伤害他人人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行为。

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是通过语言攻击他人的自我概念,以达到在心理上伤害他人的行为(Weaver,1997)。言语攻击使用的攻击性语言(offensive language),主要是谩骂(abusive language)和带有偏见性的语言(biased language)等。通过辱骂诽谤、毁人名誉等言语行为,使被攻击者产生蒙羞(humiliation)、沮丧(depression)、失望(despair)、绝望(hopelessness)、困窘(embarrassment)、愤怒(anger)等消极感受(Infante,1995)。

1.2 观众言语攻击现象及特征

我国足球场观众在看台上言语攻击现象由来已久,北京赛区的“京骂”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凡是对主队不利时,在裁判判罚失误或对方球员犯规时,甚至裁判正确的判罚、对方踢出漂亮的好球时,球迷观众都会出言不逊、破口大骂。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偶尔地骂,而是全体观众不分男女老少、一起整齐地恶意谩骂。“骂潮”,这种球迷群体中一股极不健康的潮流,已经成为看台上一种无法医治的毒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2CTY005)子课题。

收稿日期:2006-01-15

作者单位:1. 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在读研究生,太原 030006;2. 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太原 030006。

瘤,这种势头愈演愈烈,乃至全国各地都有其极具代表性的由地方口音演绎的“京骂”(见表1)。

表1 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的具体内容

种类	地点	代表性骂语
京骂	北京	“牛 x(bi)”、“傻 x(bi)”、“x(cao)你妈”
川骂	成都、重庆	“雄起”(Erection)、“踩扁某某”
陕骂	西安	“贼(zei)”
宁骂	南京	“呆 x(bi)”
	上海	“流氓”、“垃圾”、“憨大”、“猪猡”等
	山东	“黑驴”(黑哨)、“边驴”(边裁)
	大连	“血彪”(类似“傻 x(bi)”)
	昆明	“板扎”
	天津	“大傻 x”、“笨蛋”、“傻贝儿贝儿”(傻子)
	广州	“丢”、“顶你个肺”
	贵州	“弹起”
	昆明	“挺起”
	济南	“滚!滚!”、“下课”
	河南	“傻了巴叽”
横幅	各地	“解散中国队”、“某某队,滚回去!”、“某某记者,傻 x!”

(注:骂文字是骂语言(口头言语)的扩展,是骂文化现象的产生源头。那些利用标语横幅来谩骂球员、教练及记者的行为,也是一种言语攻击行为,而且,能起到口头骂人所达不到的效果。)

观众在观看比赛过程中,有意使用骂语或偏见性语言的行为是一种工具性言语攻击行为,即该行为是为了达到在心理上伤害其他比赛参与者和发泄自己不满情绪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其具体表现主要有:(1)专横的言语行为(bossyverbalbehavior):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场上人员,如“滚”等;(2)嘲笑他人(teasing others):通过言语奚落他人,并对他人造成情绪上的不适、痛苦或伤害,如“傻 x”、“傻了巴叽”等;(3)非建设性地批评他人的工作(nonconstructivelycriticizingtheworkofothers):观众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指责教练员的工作,如“下课”、“解散中国队”等;(4)做出讽刺评价(makingsarcasticremarks):用具有贬损意味的语言来评价场上人员的行为,如“傻 x”等。

攻击是一些可以观察的行为(Long&Brendtro,1993)。从表现形式上看,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行为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集群性:足球观众虽然是一种临时群体,但其言语攻击行动仍然具有集群特性——观众的集体咒骂、说猥亵的话等,这也正是其反社会群体行为(Thirer&Rampey,1979)的充分体现;(2)指向性:观众的情绪总是由一些与比赛息息相关的事件引起的,诸如裁判的判决、双方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对方球迷的表现以及其它方面的影响因素等。因此,其言语攻击总是指向一定的具体对象,包括场上的球员、裁判、对方球迷以及其它事物,这些都成为观众言语攻击的主要对象;(3)易发性:同国际足球水平相比,无论是球员的技术层次、职业水准,还是裁判的执法水平、赛事的运作能力,我国职业足球都处于“初级阶段”,这与球迷高标准的期望值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虽然这种挫折感并不是导致言语攻击直接的原因,但是也为言语攻击行为创造了一种唤醒状态或准备状态(L.Berkowitz,1989)。其次,与年长者相比,青年观众的社会适应能力尚未完善,其焦虑水平相对较高;当处于观看比赛的应激状态下,青年观众自控的持久性也会比平时表现的相对较差。其神经质倾向较强,易

紧张和冲动,较难控制情绪。因此,在观赏比赛过程中会因为缺乏自控力而极易受到情绪的不良影响。而且,一旦被比赛观看过程中出现的急躁、烦恼或愤怒的情绪所激发,一些观众就会毫无顾忌的进行言语攻击。

2 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现象的分析

从最狭义的语境理解,观众言语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安全阀”(socialsafet yvalve)的作用,但是,足球场看台上的“骂”文化产生于粗俗文化,其负面影响要相对明显一些。观众在使用攻击性言语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时,会造成他人心理伤害、污染社会的语言环境、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等不良的社会影响,某些恶毒的言语攻击有时还会使人们做出愤怒的、甚至偏激的反应,从而导致观众暴力事件的发生,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都与体育运动所倡导的体育精神文明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不应该将球迷的激进行为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安全阀门,相反,要净化看台言语环境必须反思产生观众言语攻击的运行机制。

攻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多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观众言语攻击行为的运行机制:攻击动机的“本能论”解释了观众产生攻击的生理心理学基础;“挫折——攻击理论”是对产生攻击的心理机制的理论支持;“社会学习理论”则是对形成攻击的行为主义分析;集群行为理论(包括循环反应说、辐合理论、紧急规范作用论、价值累加理论)是对出现大规模观众集体言语攻击而不是少数观众个别言语攻击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那么,为什么我国足球场观众更多的选择“骂”这种形式,而不是其它表达方式来宣泄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呢?相互作用论(Bandura,1978)认为,环境、认知以及行为变量(behavioral variables)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本文从我国足球场的环境因素、足球观众的自身因素、情绪及其外化等三个角度对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行为进行剖析。

2.1 我国足球场的环境因素

B.F.Skinner (1957)认为,在人类言语行为中,外界因素最为重要。强化是语言反应连续发生的必要条件。在一场比赛中,观众面临的很多情境都会引发愤怒、挫折和侮辱等情绪。这些观众在比赛现场受到的刺激和得到的强化都有可能引发言语攻击,因此可以认为,足球赛场的观看情境就是骂语实施的语境,观众言语攻击行为是观众行为与球场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2.1.1 榜样性启动

通常,情绪对人的社会知觉有很大的影响。足球场是一个最容易展示文明,也是最容易偏离文明的场所,这从根本上容许观众来这里尽情地喊叫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处于激情状态下的人们最容易感情用事,对别人产生偏见,即使观众原本持有的社会知觉是正确的、客观的,也会由于情绪效应而变得偏激。在狂热的环境中一些观众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其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也缺乏足够约束力。这些在观众群体中去个性化的少数个体在“有意无意”中所发生的言语攻击行为,成为了其他观众的“榜样”。

观众的集体骂人行为是由于少数“榜样”的媒介作用而得到加强的言语攻击行为,它的习得和保持“强度”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依赖于“榜样”刺激的强化。这是因为从众行为的力量会驱赶人们继续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现场观众的群体氛围所形

成的“场效应”会使得他们情绪发泄的欲望一经产生,其声势就在看台上迅速扩散。此起彼伏的波浪式的集体骂人就如同一次又一次的脉冲,脉冲式的快感使观众们感觉到更加快乐,以至于形成现场观众大规模的集体骂人。

其次,观众选择使用“骂人”这种强迫型的策略,而不是选择能被社会接受的策略来表达和发泄情绪,也会加强他们对言语攻击团体的依赖。言语群体和刺激强化的密切关联,为强化观众言语攻击行为提供了所必需的条件。因此,骂人的那些观众也更容易因为从事言语攻击行为而得到强化。使得观众言语攻击一旦开始,“就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更加之,我国足球观众中,成熟型以及素质水平趋于成熟型的足球观众所占比例较小,这是使得我国职业联赛赛场难以呈现出热烈活跃且高度文明的气氛境界的原因之一。

2.1.2 社会控制软弱

社会控制包括硬控制(法律和制度)和软控制(信仰、舆论、宗教、道德)两种控制手段,它们社会良性运行的有力保证。观众在赛场看台上进行集体言语攻击,是我国在高速转型过程中社会控制弱化的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球场观众的群体心理、群体道德、群体感情的社会导向和控制。

从本质上讲,语言文明的上位范畴主要是精神文明。语言的约定,语言意义的形成和获得,语言的运用是通过意识、精神途径进行的一种精神现象(姜德军,2002)。任何言语行为,包括言语攻击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道德和社会价值规范的问题。相对来说,文化层次比较高、具有相当道德修养水平的人使用骂人话较少,即使用了,也很少使用与性有关的骂人话,公开场合更是这样。而我国足球场观众使用的骂语,多与性丑化相关:有的直接以性器官名词来骂人;有的将其他人体器官比作性器官来骂人;有的以性行为骂人,且多与被骂人的女性尊长亲属有关。从骂意上来看,在观众集体“助威”中,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了与性器官和性行为有关的词语。由此可见,我国足球观众的思想道德修养不容乐观,缺乏行为规范的约束是其集体呼骂的原因之一。

在观众言语攻击发生的前后,也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威慑和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足球场看台文化环境与文明程度恶化的消极作用。

2.2 我国足球观众自身的因素

认知心理学认为,刺激虽然重要,但它不能成为直接说明攻击行为的原因。足球场看台上的言语攻击行为是语言使用层面的问题,除了与球场环境有关系以外,还与观众自身的因素有关。

2.2.1 认知偏向

社会信息处理(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过程中有明显不同的方式,因此会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信息处理模式的理论认为,在许多情境中,若观众能妥善而完整地进行社会信息处理步骤时,会有较好的表现。否则,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导致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产生。

观众在观看足球比赛过程中言语攻击的这种社会行为表现是对外界信息一系列认知处理过程的结果。某些观众在理解、诠释外界刺激信息(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ues)时,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因此,会带有明显的敌对性归因倾向(the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与愤怒的情绪感受。他们对自己球队以外的所有球队、球迷都充满敌意和攻击性,将对手视

为敌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一些足球观众狂热且具有片面绝对的、偏激的胜负观念。这使得他们的认知机制在行为决策(behavioral decision)时,会受到比赛现场环境因素的严重干扰,忽略了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的存在,从而产生认知偏向。他们把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或挫折简单归因于裁判员、球员或对方球迷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做情境归因。这也使他们难以冷静地考虑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更无法客观地评估选择的对策和行为的后果,尤其在强调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比赛的时候更是如此,即采取了“寻求满意”而非“寻求最优”的应激性言语攻击(reactive verbal aggression)行为。

2.2.2 社交技能贫乏

球迷需要一些简短、容易喊整齐的口号,以及足够有力的表达方式宣泄他们在比赛现场那种高度兴奋得情绪和激昂的情感。由于我国球迷相对稚嫩,他们能够使用的替代性社交技能十分有限,缺少一些既适合表达情感又能鼓舞士气、发泄情绪的文明的助威方式(如口号、歌曲、肢体语言等)。在这种情境下,一些观众在明确他们自己的目标(clarification of goals)时,对群体关系目标的定位倾向于采用攻击性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注重自己想达到的目标结果,而不在意良好关系的形成。因此在决定所要采取的宣泄情绪的对策(response decision)过程中,认定攻击性的言语行为更能体现其信心、展示自己的实力,同时能够确立他们的交往地位。而以“京骂”为代表的言语攻击符合被观众所认可的临时行为规范,符合其特定语境下普遍的道德水准的要求。因此,在处理情绪宣泄时缺少一些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观众被激怒的情境下,这种适应性言语攻击(proactive verbal aggression)行为成为唯一的实施行为(behavioral enactment)。

2.3 言语攻击的行为变量——情绪及其外化

足球商品化的结果在于注重足球的使用价值——“意义”和“快乐”,即为球迷创造出涵括个性化的生存价值和自赋意义的足球观。在此层面上,球场观众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或是参与者。在能动性的指导下,球迷在观看足球比赛过程中制造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另一方面,球迷在观球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寄情效用(symbolic utility),尤其是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无以落实或不可能表现出来的爱恨情愁寄托于足球,而不是通过观球实现“在街头横冲直撞”。这种对足球的迷恋,使得观众在观看足球比赛过程中,会经常性地产生不满或愤怒情绪,而这正是言语攻击行为与动机(特质动机和情境动机)的中间变量。

詈骂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情感(攻击性)语言所表达的感情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是其他交际用语难以企及的。所以,“骂”则自然而然地成为观众情绪外在表现的一种形式。由于谩骂和诅咒词汇逐渐被“虚化”和“非对象化”了,那些来自性方面的谩骂,有时可能只是由于习惯或潜意识,不再具有特定的意义或指向特定的对象,而且多数观众也可能不会意识他们的外显行为已经具有攻击性,这些都是使言语攻击在足球场看台上大行其道的原因。尽管如此,谩骂和诅咒词汇仍然与人类禁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人心灵深处所畏惧、所厌恶并给其带来危险、灾难的“灾物”有着内在关联。不论是嘲骂、怒骂等,无不是以寻求精神上战斗的“胜利”,求得一时的心理平衡,浇铸胸中之块垒。可以说,骂人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胜利法,是球迷观众一厢情愿、自我陶醉的工具,是“平复精神波浪的熨

斗”!

此外,由于其场合的特殊性,言语攻击更能起到一般正规交际语言所不能起到或起不到的特殊功用。一个群体通过交往必然要产生一定的群体结构,每个群体成员在这个群体结构里又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活动方式来确定自己的交往地位。群体里成员交往地位的确立最初是通过赤裸裸的相互攻击行为来完成的,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交往地位的确立演化为通过仪式化和象征性的攻击行为来完成。攻击性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表现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能激怒对方,伤害对方的感情,正所谓“伤人以言,重于剑戟”。观众利用一些攻击性语言口号、标语等形式,将对方球员或球迷加以贬低或辱骂,可以提高己方的群体士气,改善交往地位,使自己阵营中的成员认为对方无非是一些“乌合之众”,顿时就会“灭敌方的士气,长自己的威风”,“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以,在两个球队观众对垒时,向对方高声叫骂,不仅可以震撼对方,鼓舞己方士气,而且可以“乱敌阵角,迅速取胜”。

3 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的应对策略

以上所述并不能说明观众言语攻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观众集体骂人都是不文明的语言现象,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迎奥运精神文明建设中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必须制订相应的干预策略,尽可能缩小观众言语攻击的使用范围,降低其使用频率,从而净化我们赛场语言环境。

快乐是人类唯一的终极目标,其他一切(包括言语攻击)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同时,人们不会对脉冲式的愉快产生适应(adapt),球迷对于足球比赛的胜负所存有的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感伤(宋凯,1996),因此,没有言语攻击的时候,观众也不会特别不满意,这也就构成了应对我国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的可行性。

观众言语攻击行为是情境因素、观众因素及行为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相应的预防和控制不能仅仅依靠宣传等心理干预手段(见表2),还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即需要采用预防策略、中断策略的系统应对,进而减少言语攻击行为的发生比率。

表2 我国近年来针对观众言语攻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时间	措施
2000.4.30	中央领导就我国足球甲级联赛球场安全问题做出重要批示
2000.7.12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提倡文明赛风、维护足球比赛秩序的通知》
2001.6.3	今年国安俱乐部成立了球迷啦啦队,用鼓声压骂声。
2001.6.4	北京工人体育场《做首都文明球迷承诺书》
2002.3	成立“绿色狂飙啦啦队”,发布倡议,征集文明赛场、替代京骂的口号。
2002.3.1	北京赛区用高音喇叭声音“压”京骂声,悬挂“消除京骂,清洁赛场”标语。
2002.8.18	“信报群阳光使者”现身工体,呼吁球迷文明看球,杜绝“京骂”。
2003.2.20	北京国安足球队发表“致球迷公开信”,呼吁北京广大球迷在新赛季抵制“京骂”,为北京赛场营造良好的气氛。

3.1 预防策略

我们可以综合社会各界(舆论媒体、俱乐部、球迷协会等)的力量和优势,对足球场观众的言语攻击进行多种事前干预,防患于未然,最大程度地减少言语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恰当的强化策略以及有效的行为减少策略是观众言语攻击行为的预防策略。

3.1.1 行为强化——球迷文化设定

文化的深层次底蕴可以影响语言、改造语言、丰富语言,使语言更好地显示其功能。虽然球迷文化并不在攻击性言语使用者有意识的范围之内,但是,系统化的球迷文化设定会构成观看比赛现场语境优选的语用方式,它是每一个球迷文化语用共同体成员——观众——进行言语行为、参与言语互动、理解和解释互动中的话语所必要的参照和指导。因此,有必要通过球迷文化设定,纯化、强化球场观众用语,即有计划地组织和指导球迷与观众进行球迷文化塑造与建设,强化(reinforce)社会所认同的预期行为,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减少他们的言语攻击行为,更是加速我国球迷观众的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然之路。

观众的言语行为受到球迷文化的设定而承担球迷文化语境功能,首先应该遵循合理配对原则(fair pairrule)进行行为强化,即选择一个替代行为(预期行为)来替换言语攻击行为,并且予以相应的强化。可以通过征集和优选助威口号、歌曲、肢体语言,并且开展球迷文明助威活动的知识培训和动作、口号、歌曲的演练,给球迷印发啦啦队的标语口号、节奏和队歌的宣传单,引导观众文明助威、文明宣泄自己的情感。

球迷文化设定一旦成为语用共同体的普遍语用意识,就会指导或引导现场观众彼此之间的言语互动,促进良好互动氛围的形成和比赛文明地进行。其次,球迷文化设定一旦优选了一套言语行为和互动方式,就会使之承担起维护和巩固文化价值体系的功能。这套方式的确立也起到了鉴别异己言行和方式的作用,对一切相异的言行加以纠正,甚至删除。这样,可以从具体言行入手,杜绝诸如言语攻击之类的异己文化对本文化价值体系的破坏。

3.1.2 行为减少——社会控制

从社会功能上看,语言也主要体现在精神产品领域,属于道德范畴。一个社会语言行为的质量,主要是由其道德修养决定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言语交际秩序的好坏,也是由其精神文明程度决定的(陈汝东,2001)。“言为心声”、“慧于心而秀于言”、“礼禁于未然”,都说的是思想道德是人们言语文明的基础。因此,舆论媒体及各方力量,包括俱乐部、球迷协会等可以利用媒介优势,对球迷进行事前干预,并形成具有一定声势的文明观赛的舆论压力,以正确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引导球迷树立正确的胜负观念,倡导文明观看比赛,维护赛场秩序,谋求观众群体最大程度的自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评价、自我强化)。

此外,言语攻击行为是否受到抑制,还取决于对因攻击性行为招致惩罚或其他不良后果的预期,预计某一攻击性行为将招致的惩罚越肯定、越重,发生该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从社会控制而言,这是一种渗透的网络,一种无处不在的控制,一种无形的作用,出台一系列球迷法规有助于强化对观众的控制。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法律作为权力的象征符号主要是借助宣传教育、大众传媒来塑造形象和树立权威。因此,大力加强广大足球观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观念的培养,使之自觉遵守纪律和法律,使法治工作成为有效控制足球场观众

言语攻击发生的有力手段。

3.2 中断策略

中断策略,就是运用中断行为链(interruption the behavior chain)的一些方法来减少观众言语攻击行为的相关策略,是在观众言语攻击行为即将实施或已经实施之后立即采取的,并且能够减少该行为未来发生概率的一些手段。

3.2.1 现场监控

大多数情况下,观众言语攻击行为受比赛现场情境影响,而且,言语攻击行为是分阶段发展的,某一阶段的行为来自于球场观看环境产生的可预期的反应。因此,通过识别和避免言语攻击的前提条件(antecedent conditions)可以有效的减少言语攻击。

比赛组织与管理方、球迷会或俱乐部可以设立语言警察,实时监控整个比赛现场的环境,以鉴别与不良行为相关的环境条件,在第一时间发现先行事件(antecedents)及其结果,以便启动预案,实施积极的应对措施。

3.2.2 指导性控制

观众言语攻击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即旨在宣泄情绪、排解挫折,一旦挫折被排除,此种行为也就终止了。因此,有必要对球迷观众在激烈比赛情境中的期望行为进行指导性控制(instructional control)。对于某些即将失去控制的观众,管理者(球迷组织或官方组织)应该清晰地指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以及他们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这样提供指导与中断行为链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3.2.3 立即处理

观众的言语攻击大多数都会引发对方球队支持者的还击。当一个球队的观众实施了言语攻击,受害的一方就会反击,并且攻击程度会有所加重。这样就发展成为一场言语攻击力量的战斗。如果此时球场管理者对观众言语攻击行为采取消极反应有可能对其起到强化作用,进而增加该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反之,则能起到惩戒的作用,降低言语攻击行为的发生概率。因此,一旦发现观众有言语攻击行为,应该立即予以处理,包括制止、隔离及惩罚等措施,这可以有效中断言语攻击行为的继续进行或波及更大的观众范围。

3.2.4 避免无效措施

无效措施非但不能控制不良行为,而且会塑造不正确的行为榜样,甚至会加剧事态的严重性。例如用高音喇叭来掩盖观众集体骂人的声音,这种做法不仅无力改变观众的言语攻击,而且会激怒观众或强化从而形成更大声势的言语攻击,这些负面结果的破坏潜力反而更大。因此,在应对观众言语攻击时,要相当慎重地选择应对措施,避免无效措施的使用。

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开放的公众舆论领域,使球迷的激情与力量通过健康的语言、对话而不是对抗与冲突表达出来。个体的能动性越被强调,就越有可能出现制度性压抑力的扩展。换句话说,球迷的能动性越是得到解放以克服现代性中体制或制度所造成的足球问题,现代性的控制力就越强(郑新华,2002)。

4 小结

球迷和观众作为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一种被动的历史动力始终存在,他们的语言是我国足球文明的信息载体、传播工具,甚至是繁衍媒介。因此,倡导观众文明观球、消除言语攻

击,成为我国足球运动健康发展的必然之路。而足球场观众言语攻击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应的应对和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要求社会多方面力量联手共同参与其综合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国足球赛场秩序向着更加文明有序的方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石岩. 球场观众暴力的理论阐释和因素分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1 (1): 1-5.
- [2] 石岩. 我国球场观众暴力遏制策略的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03, 24 (5): 13-16.
- [3] 黄竹杭, 石岩. 我国男子足球职业联赛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研究[J]. 体育科学, 2002, 22 (6): 51-53.
- [4] 宋凯. 当代中国足球迷现象解析[J]. 体育科学, 1996 (6): 11-18.
- [5] 郑欣. 理智与迷狂: 青年球迷及其行为研究[J]. 青年研究, 2000, (9): 1-7.
- [6] 郑新华. 球迷的文化解释[D].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年硕士论文.
- [7] 周晓虹. 集群行为: 理性与非理性之辩[J]. 社会科学研究, 1994, 16 (5): 53.
- [8] 卢元镇. 体育运动——社会健康运行的安全阀[J]. 中国体育科技, 1995, 31 (1): 34-35.
- [9] 张志东, 孔祥安. 足球场暴力成因与防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88, (3): 12.
- [10] 肖华. 绿茵场外的足球世界[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6: 19.
- [11] 唐征宇. 浅谈体育运动中的攻击性行为[J]. 心理科学, 1997, (20): 276-278.
- [12] 董华.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再论北京赛区的“京骂”潮[J]. 足球世界, 1996 (16): 1.
- [13] 江结宝. 骂语的构成与分类[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0, 19 (1): 101-104.
- [14] Robert J. Shiller. 非理性繁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15, 118, 140.
- [15] 陈汝东. 语言伦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32.
- [16] 维雷那·卡斯特(Verena Kast)著. 怒气与攻击(张国锋译)[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136-149.
- [17] 姜德军. 语言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J]. 前沿, 2002, 11: 89-91.
- [18] 刘福根. 汉语骂词文化意蕴例析[J]. 浙江社会科学, 1998, 5: 124-128.
- [19] 孙顺霖. 中国人的骂——文化趣谈丛书[M].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5.
- [20] Simons, R., & Taylor, A. A psychosocial model of fan viol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1992, (23), 207-226.
- [21] Richard L. Weaver. 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77-183.
- [22] Infante, D. A. Teach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Control Verbal Aggression[J].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1995, 44 (1), 51-63.